

報導文學在臺灣，1949-1994

須文蔚*

《中文摘要》

綜觀台灣報導文學在過去四十年的流變，不難發現此一特殊文體的源起與發展，實基於特殊的時空條件。本文試圖透過分析報導文學對於新聞學與文學兩個領域的衝擊，以揭露其特質。並且歸納出理論論述上，導致爭議不休的兩個因素：一為忽視創作者之目的性，其次為方法論的欠缺。

近年來，由於文學理論變遷，媒介之經濟奧援不再，加上創作艱辛，導致後繼乏人以及相關理論論述不足等因素交互影響下，已經使報導文學日漸式微。值此之際，理論界應反思如何以報導文學的特質，作為定義的基礎，以全觀性的角度重行建構報導文學的方法與理論，揚棄過去援引附會純淨新聞寫作標準的模式，鬆開報導文學創作者的束縛，還原此文類原始的面目。

壹、臺灣報導文學之源起

報導文學在臺灣的源起，部份推動者試圖由中國文學史中溯源，甚而以史記、詩經為報導文學之濫觴（高信疆，1979）⁽¹⁾，然而報導文學在臺灣的出現實基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意義，如此的溯源方式，不免將焦點模糊。探究直接的因果關係，臺灣報

* 本文作者須文蔚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導文學自宜以中國三〇年代的報告文學、通訊⁽²⁾，以及美國七〇年代的新新聞學為源頭（皇甫河旺，1980；鄭明嫻，1988；彭家發，1993）。

報導文學在中國應於二十世紀之後正式出現，是一種經過移植而來的文體。若考察報導文學在西方的發展，可分為兩大源流：一是社會主義報導文學，一是美式報導文學（鄭明嫻，1987）。而中國的報導文學演進，則是在不同的時空中，先後承繼了不同形式的傳統。詳言之，社會主義的報導文學發軔於三〇年代，當時稱之為報告文學。而台灣在七〇年代一時蔚為風潮的報導文學，則是繼受三〇年代報告文學之餘緒，並深受美國新新聞學的影響。

一、三〇年代的報告文學

三〇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提倡「創造我們的報導文學」，發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形式與我們的任務宣言」，指示要以這種文學形式，為政治服務。由於戰爭及時代的悲劇，報告文學在抗日時期流行一時，對社會及時局都有強烈的批判性，成為當時的文學主流（周錦，1987；彭家發，1993）。

儘管披露時弊的報告文學本身無罪，但在中共文藝政策使力之下，對社會以及國家造成極大震撼。報告文學在中國文壇，本來是可以自成一體，或在散文的國度裡開創出輝煌的成就，可是由於在萌芽時期便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作了宣傳文字的寄生體，便不免走上了與雜文同樣的命運（周錦，1974），更使得現代文學的文類討論中，報告文學始終未獲得一席之地。

事實上，縱令不從意識型態的角度評價報告文學，早期所謂的報告文學，許多作品只能說是一種速寫，這種速寫，雖然不乏奔放的感情，卻缺乏關於現實事件的細密研究和分析，常常忽略了事件的歷史動態。作者對於事情的全面沒有賦予明確的形象，對它的特徵也不能用藝術的手法浮雕出來（周立波，1936）。因此，早期的報告文學曇花一現，實在和創作者遭遇到文學創作的瓶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對於報告文學有如驚弓之鳥，在民國六〇年代中葉之前，臺灣幾乎是聽不到這個名詞。當時對於報導文學作品也多所貶抑，例如新聞學者程之行就曾經批評這類作品重於事實的推敲，作者藉此宣示主觀的看法，而不顧新聞的客觀性，時效方面也不重視，一開始就與新聞本質有矛盾。政治氣氛的壓縮以及官方對媒體的全面操控之下，報導文學在臺灣根本缺乏發展的條件。直到柏楊以「異域」一書，在六〇年代初，普遍受到文化界的側目，算是首度挑釁了報導文學在文壇幾近三十多年禁制（柏楊，1985；鍾喬，1990）。

二、七〇年代的報導文學

三〇年代的報告文學固然受到社會主義報告文學的影響，但真正刺激當時多數報導文學工作者的是根深柢固的民族情感，而七〇年代在臺灣發展的報導文學理論，則是建立在新聞學新思潮的觀念之上。換言之，報導文學是由新聞報導發展歷程中所衍生的文學類型，也就是以美國六〇年代興起的新新聞學為宗師（鄭明娟，1987）。

當時美國在越戰泥足深陷，反戰之風狂熾，反戰的地下刊物一時風行。這些刊物的作者多半沒有經過新聞專業的訓練，也不受新聞寫作格式限制，他們的寫作方式刻意要顛覆傳統新聞寫作的格式。受此影響，許多嫻熟於現實體材的作家，紛紛相繼投入此一類型的寫作行列。一九七三年伍爾夫（Wolfe）編《新新聞文選》，便試圖藉此樹立這類文體的規範。

民國六十四年左右，國內學者陸續將這類著作與理論引進，《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並推出了一個新型專欄「現實的邊緣」，提倡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從事人生採訪。隨後更於時報文學獎中增設報導文學一類，試圖尋求一種「有社會性前瞻性和文學性的新聞學形式」，期使這種「直接有力、融合新聞與史觀、結合事實與思考的新形式能為文學注入新的血脈（高信疆，1980）。」

貳、報導文學的衝擊

報導文學這種由新聞學與文學兩大領域中所衍生的新式文體，也同時衝擊了這兩個領域中的固有價值。欲說明報導文學的特點，實有必要分就新聞學與文學的理論討論，才不至於發生偏頗的推論。

一、對新聞界的衝擊

報導文學的出現，必然是基於對傳統純淨新聞寫作的反動，報導文學的作者希望讓報導從「朝生夕死」的新聞事件，能提昇為具有永恆性的文學作品⁽³⁾。但是目前新聞學界對於報導文學的討論中，泰半的論述往往持新聞寫作的相同標準，用以檢驗報導文學的寫作，並未努力區別出此文類特殊之處，亦未審視寫作者所欲挑戰純淨新聞寫作的用心。

新聞學界對報導文學的定義與要求，不外恪守客觀、公正、真實的標準。早期學者的論述多將報導文學置於「新聞文學」中，意指新聞運用了文學技巧以增進誘讀作用或藝術價值，類似的推論從早期學者所下定義可窺見一二。例如曹聚仁編《現代中

國報告文學選》時，他對報告文學的解釋是：新聞文學或稱報告文學，他不是純文藝、乃是史筆，作品的成份，要讓新聞佔的多，那麼藝術性的描寫只有加強對讀者誘導的作用，並不代替新聞的重要地位（曹聚仁，1973）。皇甫河旺（1980）則綜合新聞學界的通說，列出新聞文學的五條件，亦即必須有新聞性，必須是事實，必須蒐集資料，處理資料要儘可能客觀公正，以及必須有文學的寫作技巧⁽⁴⁾。

類似上述的論述方式不勝枚舉，在這麼多的「必須」要件中，新聞學者間解釋的共通點是新聞文學可以運用文學的技巧，但必須是新聞的事實、必須客觀，然而報導文學能否融合「文學的主觀」與「新聞的客觀」兩者，正是此一文體先天上存在的矛盾關係。如果不追索新聞寫作上所產生的侷限，而單純地將文學視為新聞寫作的工具，將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亦無法描述出報導文學的面貌。因此本文試圖從報導文學對新聞界的衝擊加以剖析，以反思報導文學的理論特質。

（一）新聞學思潮的激盪

六〇年代新新聞學的風潮中，年輕一代的美國記者希望在報導中表現一己的熱情與風格，進而反抗傳統的純淨新聞寫作模式。事實上，新新聞學的運動不僅是源於記者新聞生涯青澀過渡期的反抗，更具有政治挑戰的嚴肅意圖（Schudson, 1978／中譯本何穎怡，1993）。客觀報導的反動具體在六〇年代的展現，應屬文學傳統和扒糞傳統（muckracking tradition）的復興。

文學傳統鼓勵記者寫好故事，而非四平八穩或客觀報導，因之建議作者寫出講究技巧、強調情感感染力的故事。翰妥夫（Hentoff）在一九六八年形容「新新聞學」是感情與知識兼具，能夠幫助讀者打破他與所存世界的藩籬（ibid:189）。在伍爾夫所強調的非小說寫作中，則強調了以戲劇性的場景去描述新聞事件，充分完整地紀錄對話及軼事，記錄新聞人物詳細的身份地位及行為特質，並用綜合的、有創意的觀點去描述新聞事件。甚至在新新聞的報導中，尚需動用小說技巧還原新聞人物之思想與感覺，以及把不同來源取得的人物特性及軼事加以組合濃縮（Hollowell, 1977）。至此，新聞界突破了客觀報導的框架，進入解釋報導的時代，其主觀加大、感性增加，文學的功能也得到了初步運轉的可能性（鄭明嫻，1988；羅文輝，1991：27-28）。

臺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也有著類似的困境與限制，所謂客觀公正、不妄下評論與判斷的原則，也成為政治壓抑媒體的合理化藉口。純淨新聞的限制更使得許多記者或作家感到厭倦，作家林清玄回憶記者生涯時，有這麼一段話：「並不是我不愛新聞，而是零零碎碎的新聞使我覺得整個人像陷在泥坑中鬆軟無力，固定的新聞寫作方式使我感到綁手束足，無從發揮（林清玄，1980）」。

胡有瑞在臺灣新聞報「報導文學何處去」的座談會中表示，這些年來對於許多事件的報導，讀者們所要求的已經不是當年老師所教的那套寫新聞的方式，以這種方式報導再也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現在讀者不但要看到新聞報導，而且要瞭解這新聞的背景，或其未來發展的趨勢（臺灣新聞報等，1980）。基於這些因素，報導文學脫胎於解釋性新聞報導與深度報導，因此有其特殊之一面。

臺灣的報導文學既然是受到新聞學新思潮下的產物，所挑戰的正是純淨新聞寫作所不及的面向，在新聞寫作的範疇中，事實上本就不僅限於純淨新聞寫作一途。因此，本文認為不應再以純淨新聞寫作的標準套用在報導文學寫作上。

（二）剪破新聞網

報導文學源於新聞學思潮的衝擊，其內涵並不只是「用文學的筆法報導」而已，新聞報導和新聞記者更需要提供完整的、有力的、深度的觸角，發揮創發性的思考效率，使讀者能接受一份真實、積極、震撼的報告（陳銘礪，1990）。因此報導文學對於新聞界的挑戰應當在於，讓專業新聞記者剪破新聞網，不必選擇儀式化的新聞事件，不必崇尚權威人士，因而豐富了新聞報導的內容。

新聞媒體的運作上，受限於人力、時間等限制，因此必須對記者採訪加以分工，記者必須受限於採訪路線，經常性出入特定地點，在特定時間限制下蒐集資訊，此一分工便形成了所謂的「新聞網」（Tuchman, 1978）。而就消息來源的研究上，新聞記者絕少能超脫消息來源的影響，甚至有學者主張，所謂新聞乃是權威消息來源告知新聞工作者的事實（臧國仁，1994）。而報導文學的作品，正因為未受到時間、空間的限制，大幅開闊了新聞報導的題材、內容與消息來源。

就各報社所辦的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或是標示以報導文學為宗旨的雜誌加以觀察⁽⁵⁾，發現作者往往披露出許多新聞界沒有報導過的題材。可見，報導文學的寫作者能夠不受新聞網的限制，將觸角深入許多新聞界尚未觸及的角落。足證報導文學所欲挑戰的是純淨新聞寫作的種種侷限，創作者也藉由報導文學的寫作，剪破了新聞網的束縛。

（三）「虛實」與「主客觀」

報導文學是否像純淨新聞寫作一樣，具有一定的形式，是報導文學這個文體在發展上，反覆受到新聞學界檢驗之處。此處涉及的爭議是報導文學中在以事實為本時，是否容許主觀的評述？又要如何接近客觀？虛實之間應當如何拿捏？一連串的問題都是報導文學對新聞學界拋出的質疑。

所謂「虛實」、「主客觀」，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程度的問題。近期論述

中，報導文學的定義便包含了一定程度的主觀與評論。潘家慶指出，報導文學是一種非虛構的事實，透過所謂文學的表達形式，他的目的只是在發掘一些真相，主要能夠表達作者本身的理念，而希望它能產生某一些效果（文訊月刊社，1987）。以這樣的標準，代表了允許作者表達本身理念的空間。

報導文學應當不像純淨新聞寫作具有一定的形式，如果有必要，「新聞寫作」的常見框框還是可以打破的。當然事實就是事實，事實不是小說。但在手法上，把事實穿插連貫起來，展開情節，應為可行的敘事手法。為了讓讀者瞭解，縱令使用對話或一問一答方式，使文章帶上一點小說形態，本質上還是報導文學（牧內節男，1989：163-4）。換言之，非虛構式文學寫作方式，是報導文學的重要特質。

在美國新聞界，採行非小說寫作著稱者，如《冷血》(In Cold Blood)的作者卡普特(Capote)、《王國與權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的作者塔尼斯(Talese)以及伍爾夫。他們的風格包括重新創造記者或其他人可能聽不到的對話，以及描述主角在新聞情境中的思想與感情。對這些傳統新聞學上認為小說化的寫作方式，這些作者提出的辯護理由是，作者如此接近所撰寫的新聞事件與人物，因此重新建構這些事件、人物與思想，就像寫純淨新聞的記者摘要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引言一樣地忠於現實（Hulteng, 1985／羅文輝譯，1992）。然而，重新建構事件、人物與思想，是否容許虛構的成分？似乎不易判斷。

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的「複合污染」一文在朝日新聞連載前，朝日新聞的預告稱之為「運動小說」，作者則表示：

有人懷疑這篇報導可不可以稱為小說。讓我聲明一下，所有的資料都出於專家的指導，數字更不是虛構的。不過在內容情節上的確有部份的確非事實。因此也不能說絕對不是小說。至於有名有姓的出場人物，都是實在的人物。

牧內節男(1978:164-5)則指出，像這樣的作品，如果乾脆叫它作「報導文學」，可能妥當一點。

採取上述較為寬鬆的標準看待報導文學，則作品在面對「虛實」的問題，以及處理「主客觀」的程度上，理應較傳統純淨新聞寫作的標準為寬。不過本文在此仍然必須再贅一辭，在承認報導文學特殊性以及其主觀性的同時，報導文學作品中可動用的文學技法，依然是純淨新聞的禁忌。畢竟在一般日常的新聞採訪寫作上，一旦依循了報導文學的寬鬆標準，必然會引起新聞倫理的爭議，也就是說，當記者在面臨有限的截稿時間下，採用非小說的報導方式，甚至小說的手法，自然容易引起讀者對於事實真偽難辨的困擾⁽⁶⁾。

二、對文學界的衝擊

（一）寫實主義思潮的昇華

臺灣文學在戰後的發展，一直有「新寫實主義」的呼聲，但是在五〇年代，左翼的、激進的，經中國三〇年至四〇年發展下來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思潮，在這個時代中受到全面壓制。代之而起的是個人主義的、重形式而不重內容的、只描寫個人內心葛藤、不涉及人、生活、社會和勞動的現代主義勃興（陳映真，1987）。蔣勳在接受《書評書目》的訪問時亦表示，六〇年代以後，臺灣產生了一種本土文化認同的運動，讀者要通過文學藝術來瞭解自己的問題、困境與出路，因此要求文學往下紮根，而推拒了只求能賞心悅目的風花雪月。爲了滿足讀者的要求，文學工作者的價值方向也改變了，他們摒棄了唯技巧論，唯個人感情論，而撲向社會現實之反映（王谷、林進坤，1978）。

七〇年代臺灣受到數次政治重大衝突，這些衝擊有時是足以動搖國本的毀滅性事件，刺激國人提高了反省的層次，也使得社會上層建築的文化掀起了壯大的覺醒運動（葉石濤，1987）。具體反應此一文化上巨變的現象，就是文學界的「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

七〇年代初期，香港的關傑明發表了批評現代詩的文章，激起了「現代詩論戰」。在論戰中，論者批判了現代詩的個人主義、形式主義，也批判了現代詩的晦澀，無民族風格，積極提出了文學的社會性和群眾性（陳映真，1987）。正逢其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推波助瀾下，在民國六十四年策畫推出第一個報導文學專欄「現實的邊緣」，並於民國六十七年在時報文學獎中設置報導文學獎。

在時報推出報導文學獎的前一年，亦即民國六十六年，文學界正激化出「鄉土文學」論戰，其中的意義，正標幟臺灣文學的變遷，並告訴世人：現實主義的文學又重現臺灣文壇，臺灣文學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階段（呂正惠，1992a）。從七〇年代勃興的鄉土文學及報導文學風潮，可以看出臺灣五〇年代的那種無「自信」、心靈「封閉」的現象，六〇年代從思想到文化競相西化，所謂「橫的移植」，都已爲新生代的年輕作家一掃而空（胡菊人，1990）。

報導文學在七〇年代的意義莫過於，憂民淑世的新生代知識份子紛紛走出學院，成爲文化界的尖兵，熱情與理想匯聚成一股道德勇氣，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投射在他們所生存的空間（李瑞騰，1984）。回顧七〇年代報導文學的興盛，並不僅僅是單純的

寫實主義復甦，如是的寫作形式不妨視為從文學理論思潮的變遷昇華出的一種新的實踐方式⁽⁷⁾。對文學工作者而言，透過這種服務於現實人生的良心作業，文字工作已經不是純粹的創作，更包含了追求真實與推動變遷的目的性了。

（二）副刊與人文雜誌引導創作

從文學界的生態環境觀察，報導文學是由副刊與人文雜誌所催生，正因為大眾傳播媒體一方面設立了許多知名度高的獎項，另一方面，不但在文學獎中媒體設置提供了高額的獎金，報社與雜誌社更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給有志於此的文字工作者⁽⁸⁾。一時之間，在報導文學的大纛下，副刊與人文雜誌強而有力地引導文學界的創作方向。

在一系列現代文學反省中，高信疆所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從現代詩論戰開始，到鄉土文學論戰，都一直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刊登了論戰的重要文件。不僅止於此，高信疆更推動鄉土文學、寫實文學⁽⁹⁾，企圖修正文壇的西化浪潮（詹宏志，1981）。把高信疆推動報導文學，放入此一歷史架構中，可以發現報導文學對於文學創作本身是有相當的反省意義，而副刊的文化意涵轉變，更對文學界產生刺激。

副刊在臺灣形成獨特的傳播整合型態，它們所整合的對象是個別作家、文壇和不確定的實際讀者群，副刊編務執行者納編在報業行政系統之中，既是傳播者的一部份，也是文壇結構的一部份，成為雙重組織化個人（林耀德，1991）。在高信疆主編時報〈人間副刊〉的時期，上述雙重組織化的現象才充分展現，他開創出新聞作業的新型態，使副刊已經不僅是單純文學意涵的副刊。自此，副刊擁有自己的記者、寫稿人員，企圖與時代的脈搏完全契合，與社會新聞緊緊相隨（詹宏志，1981）。另一方面，高信疆使副刊做為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彰顯無遺，報導文學正是在其「計畫編輯」的概念下，配合新聞作業方式所激發出的產物⁽¹⁰⁾。

在七〇年代末期，《聯合報》的〈聯合副刊〉主編痲弦也評估，現實性的副刊文章較受讀者歡迎，報導文學也在其中之列，因之聯副亦加入了鼓動報導文學的風潮中（向陽，1992）。同一時段，在民國六十九年與七十年之間民生報副刊〈天地〉也成為報導文學發表的重要園地（林元輝，1995）。

另一方面，加上各種雜誌如，《傳記文學》、《綜合月刊》⁽¹¹⁾、《漢聲》、《皇冠》、《時報週刊》、《人間》雜誌、《大自然》等，這些刊物分別先後投入報導文學的領域，將報導文學的影響力擴大。由於守門人的主導，自然對於作家的創作產生引導的作用。

參、報導文學的爭議

報導文學固然對新聞學界與文學界都造成衝擊，值此之際，也引起新聞學者與文學理論家則站在不同的立足點，對報導文學有著不同程度的定義、批評與要求。細究報導文學引起之爭議，實源於創作者具有促動社會變遷的目的性，而長期各方質疑不斷的另一個主因，便在於報導文學方法論上的欠缺。

一、報導文學的目的性

從報導文學發展的背景與創作者的目的可見，報導文學有別於其他文類之處，就在於此文類擁有強烈的目的性。也正是這種目的性，違背了文學所強調的藝術自主與創意，違背了新聞或社會研究所強調的客觀與真實，而使它招致各方的責難。

事實上，上述的責難似乎忽略了報導文學的特殊性格。回溯中國的報導文學傳統，作品中訴求一定的目的是相當清晰的現象。抗戰時期的報告文學能成爲一種重要文體，便在於因應喚起民眾的目的（痲弦，1987）。早期報告文學作家孫陵（1987）在《邊聲》後記中表明寫作《邊聲》的原因：

我想藉此可以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招來更多的讀者，我並不是爲寫文章才寫文章的，我要奮鬥，我要控訴，我是用它作爲一種奮鬥和控訴的工具的。藉此可以使讀者深刻化了他們原有的愛與憎，我希望，我能夠將我的苦痛像疾病一樣的傳染給他們。若果有一個人，他能夠因讀我的文章而增強他一分愛憎的信心。若果有一個人，他能夠因讀我的文章而加重一點他抗敵的情緒，這已經是出乎我的希望以外了。

相當能夠表現出報導文學與文藝創作以及新聞寫作的差異性。

臺灣的報導文學作者，明顯地繼承了報告文學重視目的性的血統。林清玄（1969）即指出：「當我想起那些咬緊牙關面對生活的人群時，我感覺到寫出他們的生活叫大家來關心改進，比起空想的創作更能吸引我的心志。」李昂（1984）亦表示：「能觸及問題及對社會有功效，是我對報導文學最基本的信念⁽¹²⁾。」顯然，報導文學作者所強調的往往是其作品強大的社會功能，而這些目的與企圖實踐的社會功能，都不是純淨新聞或是純文學可以直接達到的，期待學者專家評述，不如投入觀察、寫作以及報導。

向陽（1975）在評「旅次札記」時表示，這種以較特殊的專門知識爲基礎，以集

中、統一的筆調加以呈現，並能提出作者透過某一物象所表達的意見，而獲得普遍關注的寫作方式，是國內散文界所缺乏、而未來需加強的。鍾喬（1990）也呼應，報導文學是一種能激發個人創作動力、且具備社會改革功能的文學類型。

正因為報導文學具有特定的目的性，引起另一個最常被批評的題材問題。例如潘家慶在《文訊月刊》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上指出，報導文學好像都是專找一些黑暗面、一些別人不注意的事，而且似乎都在指責政府沒有做好，恐怕很少討論在文化上、在社會上、在心理上、廣大群眾應該作些什麼⁽¹³⁾。

針對報導文學的目的性所引起的攻訐是不斷的，文學理論家也認為，意識型態為作者創作的原動力，但文學不能成為作者意識型態的工具。意識型態必須以文學的方式處理才能成為藝術，成為任何一方御用的工具都是文學的失敗與悲哀。而報導文學這個文體被批評者，亦在於大多數的報告者均抱持個別的、牢固的意識型態，預先設定好作品所訴求的目標，然後僅僅採取有利於己的資料，誘導式的採訪記錄，使作品呈現出偽裝的面貌（林耀德，1987）。由這段話我們不難查覺報導文學爭議的主因其實是在其「目的性」，而不在客觀性的爭執⁽¹⁴⁾。

既然是針對目的性的爭執，則創作者的社會責任感，應當是檢驗一則作品優劣的重要依據，至於題裁是否是屬於黑暗面，便顯得次要。陳銘礪（1979）認為其報導的方向和方式，絕不是意圖暴露社會的黑暗面，或挑起底層人的病態生活。如果露骨地認為報導文學是散播恐怖氣氛，那麼就無法清楚的看到一些真實面貌，連帶也無從對那些報導，在轉移和變革上具體把脈了。高信疆（1987）也說明，雖然報導文學作品中大都是一些怵目驚心的，一些黑色或灰色的景象。但問題既然存在，就該抓住它的根子，正視他、檢討他，給它的病一劑藥石和針砭。畢竟我們都愛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同胞，我們都希望明天會更好。一個成熟的社會，絕不是諱疾忌醫的社會。因噎廢食、諱疾忌醫社會也就失去了任何變化的可能性。因此報導文學並非不能「別具用心」，而是要看作者「居心何在」了。責難報導文學的目的性，主要是因為與新聞報導終究與文學作品不同。新聞媒體面對廣大群眾，其影響力不可謂不大，若以「記實」之名，行「創作」之實，藉社會公器，發揮一己之見，主觀的泛濫確有其隱憂。作者若能謹守著社會責任的理念從事創作⁽¹⁵⁾，則報導文學所發揮的功效，應當是正面而非負面的。

二、方法論的欠缺

在強調報導文學作品的說服力時，一個缺乏深入討論的問題是，報導文學的作者

是透過何種方法蒐集資料，是否在注重方法的同時，達到可以提高讀者信任作品的標準⁽¹⁶⁾？是否可以用有別於純淨新聞的要求而提高可信度？而針對此一難題高信疆就曾經指出：談到「方法論」的問題，今天的報導文學不但沒有可以依恃的理論，也缺乏相關的方法研究（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436）。方法論上相關論述的貧弱，使得報導文學的發展面臨瓶頸。

對於一個介於文學與新聞學之間的「新文類」，要從兩個源頭找出量身定做的理論依據，事實上有其根本上的困難。許多論述中都認為，在同一文學體裁之中報導語言和文學語言之間的結合不易，因為文學和報導是一組對立的觀念，既有主觀陳述則報導的客觀性必然動搖（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465；林耀德，1987：158-159）。上述的說法顯然都太執著於用個別的理論框架來套量報導文學，而沒有考慮是否應當以一套新的標準來詮釋這個新文類。

本文認為，縱然報導文學源於新聞報導，但在「客觀性」的要求必然較純淨新聞寫作為寬，應當容許作者解釋事件脈絡並說明意義。另一方面，報導文學雖然本於文學，然而在創作上不允許虛構。因此，要在方法上找出報導文學的出路，無庸膠著於「文學」與「報導」，乃至於「主觀」與「客觀」的對立，論述的重心應當轉向社會研究方法論的領域，思索報導文學特有的地位。

報導文學雖然不如社會研究嚴謹，但是若將社會研究中的民俗誌法(ethnography)引入報導文學的探求上，相信自然可以建立一套具有效度的方法與理論。事實上，報導文學創作之所以困難，便在於創作者在實踐上，往往和人類學者動用民俗誌法的嚴謹程度大致相當。詳言之，報導文學的資料蒐集通常必須經歷長期而持續的觀察，創作者必須採用「整體」(holistic)的觀點，觀照非語言的行為與語言的行為，並且以全面而深入的田野工作為憑藉，以期獲得對社會團體乃至人物的完整圖像，因之作品是否成功，端視對真實的描述是否切近而斷(Bailey, 1982; Ferrerman, 1989; 林福岳，1993)。

過去台灣報導文學的實踐上，利用民俗誌法而創作出兼具學術內涵與文學意味的作品，正可間接印證上述觀點。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在學術研究的同時，除了發表學術性的文章外，就同一題旨再從事報導文學創作者，如人類學者胡台麗，就經常在撰寫學院式的報告之餘，為他的研究對象付出關愛而發出不平之鳴，寫一些較通俗的文章為他們呼籲，把問題向社會呼籲（李亦園，1986）。

再以時報文學獎為例，首屆甄選獎首獎得主邱坤良，當時已經從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畢業，並擔任中國文化學院戲劇系講師，在研究戲劇之際，蒐集民間藝術的

資料和加上長期的田野調查，促成了報導文學的寫作。同屆甄選獎優等獎得主王鎮華之追尋書院建築，也是導因於對建築學的研究，而轉化為報導文學的寫作。

研究社會問題的學者，由於研究的取向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因此研究者不免主動或被動地寫一些較通俗的文章向社會說明。慢慢地這就形成另一種風氣，構成一種不完全以書齋，而全以社會為對象的學術傳統（李亦園，1986）。這種在學院興趣與社會責任之間取得一定程度的均衡，不但是報導文學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從方法論的角度觀察，學術界動用的民俗誌法，已然在方法上提供報導文學創作一些準據，有助於提昇作品在資料蒐集與印證事實的確實與深刻。推而廣之，師法民俗誌法對資料解釋與書寫的精神，更有助於避免陷入，在從事報導文學創作時，漫無標準詮釋資料的窘境。

肆、報導文學的式微

八〇年代以後，文學理論從崇尚寫實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興盛，文字工作再一次與寫實主義分化，報導文學呈現了式微之現象。另一方面，從報導文學的方法觀察，此一全觀性的文類，需要蒐集長期以及大量的事實資料，本來就是不易成就的工作，一旦主導風潮的媒體不再提供經濟上的奧援，則相關的創作不免減少（林元輝，1995，深度訪談）。

顯然，報導文學在台灣式微的因素並不單純，勢必從文學界以及媒介的變遷中觀察，方有可能找出在報導文學創作上的困境：

一、文學理論變遷

報導文學是基於對於社會關懷、促動改革為基調的一種文類。到了八〇年代，隨著政治活動空間的逐步拓展，這一活力充沛的文學運動，慢慢隨之沈寂，似乎不足為奇。在八〇年代文學創作圈內，寫實主義文學也面臨同樣的窘境，基本上大家對經濟很滿意，對政治還滿意，七〇年代的批判動力消失，批判的文學自然也就無疾而終了（呂正惠，1991c）。另一方面，在文學創作上，鄉土文學與寫實主義的風潮，在民主開放以後，也顯得欲振乏力，取而代之的則是後現代文學理論。

後現代文學主張完美的形式可遇不可求，因此強調創作者本身的書寫過程，因此不但文本(text)沒有主導的統一結構，文章的語體也不求一貫統一，強調「拼合」(collage)成為創作的特色（蔡源煌，1994：321-334）。簡言之，後現代主義在文學理

論上不僅和現代主義對立，也同時與寫實主義對壘，在後現代的風潮中，報導文學乏人問津成為必然之勢。

二、媒體環境變遷，經濟奧援不再

在報禁解除之後，文學副刊隨著報紙的增張漸漸退居角落，影響力逐漸式微（李瑞騰，1991：186）。編輯人爲求在激烈的報業市場上能有競爭力，「文學副刊」已然轉變為大眾文化論壇，受到大眾消費文化的影響，使得「輕、薄、短、小」成為八〇年代副刊論述的主流（林耀德，1991），報導文學因之退出副刊文學的行列。

副刊不再支持報導文學，使得需要媒介經濟奧援的作者無法繼續從事創作工作。民生報副刊〈天地〉的取消，乃至後繼以報導文學為職志的《人間》雜誌停刊，以及時報報導文學獎一度取消，都使得創作誘因中斷。另一方面，編輯人的「計畫編輯」轉向文化批評與專題製作，一旦報導文學不受新生代副刊編輯的青睞，報導文學的空間自然因之萎縮。

三、創作艱辛，後繼乏人

報導文學的創作不易，從方法論的討論可窺見一二。這樣一種需要長時間的田野工作，以及大量資料累積的創作類型，在高信疆透過時報管道培養出第一代報導文學健將後，文學界似乎沒能培育出第二代的創作者（林耀德，1987：161）。當第一代作者紛紛離開報導的行列時，更使得報導文學創作環境益形蕭索。

不僅在報導文學界出現了後繼乏人的現象，從整個文學傳播的角度來看，台灣文學「文人圈」班底 (equipe) 與世代 (generation) 銜接的中斷，使得文學表現無力，文學作品量的銳減（向陽，1995），文學發展遭遇阻礙，報導文學自然不能置身事外。

四、理論論述不足

報導文學的理論論述不足，使得此一新文類面對著各方正當性的質疑。直到近年來，縱然在傳播科系（包括政大新聞研究所）中已經設有報導文學的課程，報導文學依然要面對新聞學者對其文體及名稱的質疑（彭家發，1993：30）。另一方面，文學理論家駐足於報導文學理論與方法的建構者，則是屈指可數，使得報導文學的理論論述成為一個「新聞學」、「文學」與「方法論」的三不管地帶。

報導文學的理論論述不足，論述者間的共識不足，都將使得後繼的創作者，在進入此一創作環境時，亦發顯得束手束腳。

伍、結論：報導文學的展望

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從歷史源流回溯可以發現，深深受到三〇年代的報告文學、通訊，以及七〇年代美國的新新聞學兩種思潮的影響。報導文學在臺灣的出現自有其特定時空背景與意義，檢視臺灣近年來的各項改革，不難發現無論是在人權問題、自然保育、環保、古蹟維護等事項，來自藝文的感情層面的報導，隱然成為現實變遷最有力的推動者。文學界與傳播界的報導工作者，以現實作題材，以關心作動力，所寫的報導文學，確實曾一度對臺灣的現實，提出了豐碩的見證和可能的成績。另一方面，報導文學雖然在副刊版面引退，但是以文學手法從事新聞寫作，關懷傳統新聞網外人物、社團的作品，卻在媒體深度報導與專題報導中處處可見⁽¹⁷⁾。報導文學所撒下的種籽，事實上已經深植在台灣的新聞界，這一個層面的影響實不容忽視。

報導文學出現的同時，挑戰了文學與新聞所奉為圭臬的價值觀，在爭論「報導文學是什麼？」的同時，提出評價與規範者，實有必要先考慮報導文學作品的目的為何？報導文學所欲挑戰的侷限為何？而不是一昧的套用既有文類或倫理的規範，或過度理想的苛求它要面面俱到，兼備純淨新聞的客觀又兼具文學的創意。因此本文主張，應以報導文學的特質作為定義的基礎，亦即承認報導文學的創作，是以非虛構的方式以及文學的手法報導事實。其敘事手法可以超越純淨新聞寫作的「第三人稱」位置，進而描寫場景，甚至動用小說的對話手法，描摹情境中人物的思想與情感。目的在發掘真相，並表達作者之理念。一言以蔽之，理論界應當拋棄單純援引附會純淨新聞寫作的標準，才有可能鬆開報導文學創作者的束縛，還原此一文類原始的面目。

從現實層面觀察，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乃是藉助媒介的議題設定功能，透過守門人的計畫編輯與豐沛的經濟資源，方得以一時蔚為風潮，一切必須歸功於本土媒介環境的特色。然而近年來隨著文學環境的改變，媒介不再支持報導文學，就成為報導文學式微的重要因素。而像報導文學如是難寫難工的文類，在遭逢文學傳播環境低迷，新生代作者未能承繼風潮的情況下，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面臨了令人憂心的狀況。

本文試圖從報導文學的兩大爭議中，亦即目的性的重視，以及方法論討論的欠缺，爬梳出報導文學獨特的理論與方法上的依據，希望拋磚引玉，引發更多討論，一舉解決台灣報導文學所遭遇的窘境。展望將來，社會既然存在無數潛在的問題待發掘，而也有更多動人的事件需要被稱頌，相信在理論界累積更豐富的論述之後，本於

對此一文類的肯定，報導文學在更開放的環境中，必然有更為寬闊的揮灑空間。

註 釋

- (1) 高信疆(1980)認為，人類的歷史，當他一開始的時候，就具備了強烈的報導色彩，雖然沒有報導文學的自覺，但那些傳遞了無數生活訊息、民情風俗、個人見聞的作品都裝滿了實質的人生與歷史的現象，也可以說文學最早最大功能就是報導。然而上述的溯源方式容易與寫實主義混為一談，忽略報導文學對新聞報導的特殊意義。事實上，對於中國傳統文學裡頭是否有真正的「報導文學」不無疑問。論者謂，像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或是徐霞客的遊記，嚴格的來說並不算是「報導文學」，因為這些文章含帶了太多個人情緒化的東西，僅是失意政客或遷客騷人隨興而作的文章，而報導文學必須是客觀具有代表性的取樣，在創作的態度上，是不能夠有作者本身情緒式的看法參雜其中（王谷、林進坤，1978:8）。
- (2) 通訊(dispatch)是一種屬於新聞界的專用詞，是記者從外地寄到或用電報等方法傳到報社的報導；在戰時，記者從前線或後方等處寄回報社的通訊是常看到的報導。在中國，特別在抗戰期間及其姊妹文體「報告」(report)，不但在報紙上出現，也常見諸文藝刊物，如《光明》半月刊，胡風編的《七月》，茅盾編的《文藝陣地》，孫陵著《邊聲》，周而復著《延安文藝》等，都要比一般的報紙通訊更具其文學價值，文字更顯得優美，內容更有著感動讀者心弦的力量（葛浩文，1987）。
- (3) 亦有持相反見解者，如李明水曾就新聞學觀點探討所謂的報導文學，他懷疑大部份主張報導文學者是「江郎才盡」，對報導一詞的嚴肅性體認不夠，並主張報導與文學不得相混。不過這種「分立說」，並未獲支持，多數評論者還是持「兩者融合」的理想（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464-465）。
- (4) 其他關於新聞文學的定義，例如，荆溪人將新聞文學定義為：新聞文學是以新聞為體裁，運用文學的技巧，而產生的一種新的文學（荆溪人，1976）。姚朋在「新聞文學」一書中則強調：新聞必須根據客觀事實而非出自於作者想像（姚朋，1968）。
- (5) 以《人間》雜誌對臺灣原始森林進行報導為例，陳映真（1988:261）指出：「即使報紙增了張，每天打開來看，竟沒有一條是由他揭發出來的消息，去追蹤報導的森林大破壞的消息！『他們報紙在幹什麼吃呢？』賴春標常常苦惱地搔著頭皮

這樣自問。」可作為報導文學的作者與新聞記者之間差異的力正。

- (6) 在新聞倫理上的考驗則是，小說技巧的使用下，讀者如何知道哪些事實是現實？哪些是半虛構？要如何使讀者相信，重新建構新聞人物的思想與動機是經過費力耗時的努力，而非倉促、所知不多的猜測（Hulteng, 1985／羅文輝譯，1992）。
- (7) 在七〇年代所出現的另一個文學現象就是重視寫實性、社會性與政治性的小說，像張系國的《昨日之怒》、《黃河之水》，黃凡的《反對者》，劉大任的《蜉蝣群落》，其特徵詳參（呂正惠，1988：173-191）。
- (8) 在七〇年代中期崛起的報導文學工作者，多半任職於報社或雜誌社，其中更不乏各文學獎報導文學獎的得主，著名的作者如，古蒙仁、翁台生、林元輝、陳明礪、李利國、陳怡真、心岱等，均以採訪、編輯與撰稿為其經濟來源，許多作品也正因為媒體在經濟上支持而得以成就（林耀德，1987：156）。
- (9) 高信疆在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七日主編之《龍族評論專號》上，以筆名高上秦發表了一篇名為〈探索與回顧——寫在《龍族評論專號》前面〉的序文，其中即指出二十年來的臺灣現代詩壇，誠然有不少現代詩人，在他們一步一步走向他個人的藝術路途上時，是逐漸遠離了他所來自的那個傳統與社會；在孤獨的沈思與刻意的創造中，似已忘記了他仍生活在群眾中，也忘記了他的作品最終仍要回到廣大的群眾裡去。簡單的說，他們似已失去根植的泥土了。從上述的論述以不難窺知高信疆是如何受到當時文學運動的衝擊，並且本身也成為促事者的一員（向陽，1984）。
- (10) 此為新聞媒體議題設定功能十足的發揮，頗堪玩味，副刊的議題設定或議題建構的實證研究，似乎尚無傳播學者留意（蔡源煌，1992；向陽，1992）。
- (11) 《傳記文學》與《綜合月刊》可謂民國五六十年前後對報導文學最有啟發性的雜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434）。不過，前者專注於傳記文學，後者則對專題報導的發展立下許多範例，都並沒有特別標示為刊登報導文學的雜誌。
- (12) 李昂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白地說明他的心路歷程：「我在大學教書，自己開車，回我美麗的家，交往的朋友，都是知識分子。這樣的生活，很快使我發現，我能寫作的題材，大致不離一個受過教育的女性知識分子的生活體驗，而這種體驗，當不夠深入時，很容易造成一種美麗蒼白的女性文學。在反省之餘，這就開始了一段長達數年我稱之為『參與社會』的工作（李昂，1990）。」
- (13) 目前就報導文學作品題材加以分析的實證資料付之闕如，如以鐘麗慧(1986)所撰《近三十年報導文學選集提要》為基準，不難發現其中所選報導文學作品多數並

非「報憂不報喜」，反而以闡釋社會光明面為主題者所在多有，但是何以造成一般人印象深刻者，經常是挖掘「社會黑暗面」的作品？是否與目的性有關？或是其他因素？殊值深入研究。

- (14) 鄭明娟（1988）即強調：新聞寫作本身已具危險性與虛誕性，他是否能純然客觀呢？當同一重大事件發生時，我發現每一家報社報導的內容都有出入，並不能掌握真實。新聞記者進入現場的能力、觀物的角度、蒐集資料及保持客觀的能力，綜合起來、都不能掌握真實。再退一步而言，即使掌握真實資料，其剪裁與銜接又是一大難題，報導者僅以平實客觀的外表，引用強烈的資料的證據，而其目的又在報導與文學之外，這實已是新聞報導已經存在的危機，而報導文學要在新聞學上更進一步做文學工作，其危險性不言可喻。對照社會學家塔克曼(Tuchman) (1972:665-670)的說法，「客觀」是新聞界「策略上的儀式」(strategic ritual)，新聞從業人員會透過下列方式來表示以達到客觀：

- (一) 各種衝突可能性的介紹。
- (二) 支持性證據的提出。
- (三) 明智的使用引號。
- (四) 在適當的邏輯次序中，建構訊息。

可見，絕對的客觀無法成就，但令人質疑的是，鄭文的質疑應當是新聞報導原就已經存在的危機，甚至可說是難以達到的標準（絕對的客觀與真實），那麼在討論上，似乎應當把焦點放在報導文學作者「在報導與文學之外的目的」上，而非客觀性的爭執。

- (15) 學生時代寫下「黑色的部落」獲得第一屆時報報導文學推薦獎的古蒙仁，曾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表示：「學生時代的作品是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去寫作，除了忠於被報導的對象，在寫作方式與情懷上都是比較浪漫。但在報社作事以後，寫作就牽涉到報社的立場，個人的想像與理想，都會受到一點限制，變成為大多數民眾寫作，也必須為社會大眾負責（丁琬，1970）。」
- (16) 類似的討論也出現在新聞寫作的研究中，記者在從事新聞寫作準備時，會有一定的型式與步驟，與科學研究的過程大體相當(Parsigian, 1987)。
- (17) 報導文學對新聞寫作的影響並不易蠡測，尚有待日後進一步研究。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 丁琬（1980）：〈行者的話〉，《台灣時報副刊》，10月13日。
- 文訊月刊社（1987）：〈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之二——報導文學〉，《文訊》第29期，頁165-85。
- 王谷、林進坤（1978）：〈報導文學的昨日、今日、明日〉，《書評書目》第63期，頁6-13。
- 台灣新聞報等（1983）：〈報導文學往何處去〉，《台灣新聞報》，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向陽（1984）：〈七〇年代現代詩風潮試論〉，《文訊月刊》六月號。
- 向陽（1986）：〈序〉，劉克襄著，《天空最後的英雄——旅次札記》，台北：時報。
- 向陽（1992）：〈副刊學的理論建構基礎〉，收錄於林耀德編，《當代臺灣文學評論大系·文學現象卷》，台北：正中。
- 向陽（1995）：《戰後台灣文學的傳播困境初論》，尚未出版。
- 竹中勞（1989）：《現場採訪的第一步——現場報導的戰術與戰略》，徐代德譯，台北：人間。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3）：〈報導文學的現況與未來〉，收錄於《中華民國71年文藝季座談實錄》，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呂正惠（1988）：《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
- 呂正惠（1992a）：〈八〇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收錄於氏著，《戰後臺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
- 呂正惠（1992b）：〈分裂的鄉土，虛浮的文化〉，收錄於氏著，《戰後臺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
- 呂正惠（1992c）：〈臺灣文學的浮華世界〉，收錄於氏著，《戰後臺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
- 李亦園（1986）：〈序〉，胡台麗著，《性與死》，台北：三民。
- 李利國（1979）：《時空的筆記》，台北：時報。

- 李昂（1990）：《非小說的關懷》，台北：社會大學出版社。
- 李昂編選（1984）：《鏡與燈》，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 李瑞騰（1984）：〈從愛出發——近十年來台灣的報導文學〉，《文藝復興月刊》158期，頁50-8。
- 李瑞騰（1991）：《台灣文學風貌》，台北：三民。
- 周立波（1936）：〈談談報告〉，《讀書生活》，第3卷，第12期，轉引自，周麗麗（1980）：《中國的現代散文發展》，台北：成文。
- 周錦（1974）：《中國新文學史》，台北：長歌。
- 周錦（1987）：《抗戰「報告」》，台北，智燕出版社。
- 周麗麗（1980）：《中國的現代散文發展》，台北：成文。
- 林清玄（1980）：《鄉事》，台北：東大。
- 林福岳（1993）：《將社區劇場視為另類傳播媒介之研究——以「民心劇場」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耀德（1987）：〈臺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月刊》第29期。
- 林耀德（1991）：〈聯副四十年〉，《聯合文學》第83期。
- 牧內節男（1989）：《新聞記者的風範和信念——新時代的新聞寫作》，林書揚譯，台北：人間。
- 姚朋（1965）：《新聞文學》，台北：記者公會。
- 柏楊（1985）：〈不信喚不回——關於心岱的「大地反撲」〉，收錄於心岱，《大地反撲》，二版一刷，台北：時報。
- 皇甫河旺（1980）：〈什麼是新聞文學？〉，《報告》6卷5期，頁45-48。
- 胡菊人（1979）：〈序〉，陳銘礪，《賣血人》，台北：號角。
- 孫陵（1987）：《邊聲》，台北，智燕出版社。
- 荆溪人（1976）：〈新聞文學及其形成〉，《報學》5卷6期，頁22-27。
- 高信疆（1980）：〈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陳明礪編《現實的探索——報導文學討論集》，台北：東大。
- 高信疆編（1987）：《體檢美麗島》，再版，台北：敦理。
- 張作錦（1993）：〈「報導」和「文學」的矛盾與統一〉，《聯合報》，10月10日，頁37。
- 曹聚仁編撰（1973）：《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甲編》，台灣翻印本末著出版社。
- 陳明礪編（1980）：《現實的探索——報導文學討論集》，台北：東大。

陳映真（1987）：〈四十年來臺灣文藝思潮的演變〉，《中華雜誌》第25卷6期，總號287。

陳映真（1988）：〈我們愛森林的朋友阿標〉，《自立晚報副刊》，3月3日。

陳銘磻（1979）：《賣血人》，台北：號角。

彭家發（1993）：〈細說新新聞與報導文學〉，《新聞鏡週刊》第263期，頁30-33。

葉石濤（1987）：《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葛浩文（1987）：〈光明裡的黑暗〉，收錄於孫陵著，《邊聲》，台北，智燕出版社。

詹宏志（1981）：〈紙上風雲第一人〉，收錄於周寧編，《飛揚的一代》，台北：九歌。

痲弦（1987）：〈一代一代地寫下去〉，《抗戰文學回憶錄》，台北：聯經。

臧國仁（1994）：〈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新聞鏡週刊》第290期，頁6-9。

蔣勳（1985）：〈路遙情深——心岱與「大地反撲」〉，收錄於心岱，《大地反撲》，二版一刷，台北：時報。

蔡源煌（1992）：〈報導文學與新新聞〉，收錄於氏著《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

蔡源煌（1994）：《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雅典。

鄭明嫻（1987）：《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

鄭明嫻（1987）：〈報導文學〉，收錄於氏著《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

鄭明嫻（1988）：〈報導文學與文學的交軌——報導（告）文學初論〉，收錄於氏著《當代文學氣象》，台北：光復書局。

鍾喬（1990）：《回到人間的現場》，台北：時報。

羅文輝（1991）：《精確新聞報導》，台北：正中。

鐘麗慧（1986）：〈近三十年報導文學選集提要〉，《文訊月刊》第22、23期。

英文部分

Bailey, K. D. (1982).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Fetterman, D. M. (1989).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Newbury Park, CA.: Sage.

Hollowell, J. (1977). Fact and fiction: The journalism and the nonfiction novel.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Hulteng, J. L. (1985). The messenger's motives: Ethical problems of the news media, 羅文輝譯 (1992) : 《信差的動機》，台北：遠流。

Parsigian, E. K. (1987). News reporting: Method in the midst of chaos, Journalism Quarterly, 64(4): 721-730.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Basic Books, 何穎怡譯 (1993) : 《探索新聞》，台北：遠流。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a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660-79.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深度訪談名單

林元輝，1995，4月1日，政大新聞館。

The History and Disputation of Reportage in Taiwan, 1949--1994

Wen-Wea Hsiu

ABSTRACT

Reportage is one special style of literary works.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eportage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in Taiwan. It also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portage on th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s to the controversy of reportage, it results from the ignorance of the intention of its

authors and lack of method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reportage is on the decline. The reasons we search for are such as changing of literature theories, shrinking of mass media, discontinuity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and short of systematic research.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reconsider the attribute of reportage thoroughly to set up a more adequate theory for reportage.